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 第二批代表团访华观感

✦

新 华 通 讯 社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 编 者 说 明

以尤金·帕特森为首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第二批访华代表团二十人，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三日访问了我国。（第一批访华代表团于一九七二年九、十月间访华。）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哈尔滨、大庆、沈阳、抚顺、郑州、新乡七里营公社、辉县、南京、苏州、上海、桂林等地，自广州深圳出境。他们回国后写了不少访华观感，除两家报纸外，其余都已将剪报寄来。现从他们剪寄的文章中选译了一部分，供参考。

他们所写的关于邓小平副总理接见的报道，已见《参考资料》，未收集在内。

未注明摘译的，均为全文。

目 录

尤金·帕特森

- 《中国之行架通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 (1)
- 《崛起的中国缓慢地打开了大门》 (5)
- 《中国进入工业时代》 (8)
- 《新思想指导着中国的工业》 (11)

克里德·布莱克

- 《中国新貌，十五年内从荒芜的草原到石油自给》 (16)
- 《毛的上了发条的玩偶的国家》 (18)
- 《中国：新的观点》 (22)

克莱顿·柯帕特里克

- 《毛的“福音”使他的国家行之有效》 (24)
- 《几近是一种宗教 毛无所不在于中国的各个方面》 (27)
- 《中国对俄国由友谊变成怕和恨》 (29)
- 《新和旧的结合：戏剧性的对比》 (32)
- 《中国依靠第三世界》 (35)
- 《语言是了解中国的最大障碍》 (38)

威廉·贾尔斯

- 《液体资产》 (39)

夏洛特·塞考斯基

- 《美国怎样从中国的恐惧莫斯科症中得到好处》 (43)
- 《中国的新目标：凭热情和实用主义搞现代化，谋求成为
现代化的国家》 (44)

《公社消除了苦难，从事基础革命》，《农民：中国的力量 和负担》	(46)
《年轻人的热情能不能保持势头？》	(49)
《随着像章越来越少观察家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会使革命热 情保持下去》	(51)
《大庆油田——位于中国边境上的革命精神的样板》	(53)
《中国妇女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努力消除束缚争取社会地位》	(55)

迈克尔·奥尼尔

《看一看可思议的中国石油世界的内幕》	(58)
《在公社，中国人获得不一样的好处》	(62)
《它的世界上最奇特的军队——但是它能打仗》	(65)
《没有学者的学校——中国儿童得到扎实的有限的基础教 育但是大学遭了殃》	(68)
《宗教：仍然只是过去的回响》	(71)
《追上已失却的世纪》	(72)

托马斯·温希普

《中国近况》	(76)
《在同人民军队的交谈中，出现了一些矛盾》	(83)

罗伯特·克拉克

《中国纪行》	(86)
《妇女响应毛的号召 为中国做更多的工作》	(90)

戴维·拉文索尔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97)
《沿着北部边境一带挖洞》	(103)

爱德华·米勒

《“自力更生”之感》	(106)
------------------	-------

《新中国：有纪律和自豪》	(111)
《中国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115)
《无所不在的毛主席》	(119)
《中国的未来》	(120)

罗伯特·钱德勒

《共产党人取得令人难忘的进步》	(125)
《中国人恐惧苏联发动进攻》	(128)
《中国的生活方式以政治为准则》	(129)
《中国运输事业的进展》	(136)
《中国现在食品供求之间保持平衡》	(138)
《赤脚医生补充多样化的医疗方法》	(140)
《猜猜多少人吃饭？在中国有九亿人口》	(143)
《中国开垦土地以供养广大群众》	(147)

约翰·奎因

《艰苦奋斗，坚定信念支撑着共产党人》	(150)
《毛强行推销“学大庆”》	(154)

多萝西·朱奈伊

《小学生很热情，很机灵，吃得很好，很……》	(157)
《农民朴素的愿望和需要》	(159)

理查德·伦纳德

《我们看到的中国：农民现在无忧无虑》	(163)
《“中国之害”已成中国之福》	(166)
《中国：如此之大，如此远远落在后面，如此坚定不移》	(169)
《对俄国人的担心使中国保持警惕》	(172)

尤金·帕特森

《圣彼得堡时报》主编，代表团团长

《中国之行架通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

座机从安克雷奇起飞，就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个人们所不熟悉的国家，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它已有了好几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国家的革命是在二十五年前才完成的，比我国的革命要晚一百七十五年。这就是中国。可它头脑中想的是些什么？它心中所向往的又是些什么呢？

北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的机场，看上去颇有美国中西部某一条分支航线的一个站的那种田园风光。从罗马尼亚和菲律宾飞来的两架喷气飞机停靠在静悄悄的梯子旁边。旅客们由此步行出站。一架中国民航的英国三叉戟飞机是机场上唯一的一架正在滑动的飞机。有几架中国从美国买来的波音707停放在机场远处，这看来是训练飞行区。在这个小而简单的机场正面，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在全中国，无论是在公共建筑物还是私人住房里它都是这样俯视一切。

我们的主人们春风满面，为这一严肃的景象增添了生气。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发现在这块广阔的、贫困的大地风光中，唯一真正吸引人的东西是在人民的脸上。而人们的面孔确实是表达这种吸引力的好地方。

人们的欢迎是热情的，喧闹而充满笑声，双手紧握，坦率而自豪。他们身上肥大的兰色毛式服装给人以单纯的感觉，这种单纯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但这种单纯也会引起人们的错觉。他们让我们在机场候机室里坐下来，殷勤地敬茶敬烟。候机室象他们的衣着一样简单。我们对候机室的布置现在也变得熟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排四人，对面墙上单独挂着毛主席的像。

过分热情的介绍和问候是及时地通过推译进行的。我们乘坐着一长串中国政府灰色的不那末讲究的轿车向烟雾笼罩下的市区驰去。中国人对来访表示的喜悦，他们总是随和而且高高兴兴，他们以令人无法批评

的坦率来陈述他们那几乎是恶作剧的设想：他们不凭别的只凭双手和人的精神把这个衰老的国家带进二十世纪，凡此种种，从到达的那一天起直到最后一天，不能不使来自不通人情的西方的这些美国人受到感动。

我们象是进入了某一个庞大粗犷的童子军的基地，或者象是进入了宗教信徒的静修地。在那里人人用自信而又不惑的眼光微笑着，在那里，其貌不扬的重振道使运动的青年们随时可能走上台去唱一段“人们挺身而出呀！”不过，这里并不存在那种疯狂性。他们并不疑惑。

共产党中国的贫穷和资本主义西方的标准之间的对照是显而易见的、是严酷的。

在中国没有汽车阻塞的现象，因为人民都不自备汽车：大街上的卡车或轿车一般是公共汽车或政府机关的车辆，要不就是部队、工厂、公社的车辆。城市的阻塞是自行车造成的——目前已形成一个难以置信的自行车的人海，外加入拉的和畜拖的大车。自行车的扩散或许是中国人民在相对的意义上取得的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反映。自行车是基本的奢侈品，又是必需品。购买一辆约费七十五美元，这按中国人的工资水平来说，等于在美国买一辆小轿车。

一位美国友人试图形容我们在这个国度里即将到处看到的令人毛发耸然的，几乎会丧命的交通事故，他说：“中国人缺乏一种方向感。”骑车的人还不领会一辆汽车在逼近的时候的速度和角度。事情可能就是这样。也可能这是中国工人、农民一种杰傲不驯的最高表现。骑自行车的群众，甚至在最宽阔的林荫道上也和汽车争车道。以一种我所看到过的最最固执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无视那震耳欲聋的喇叭声。自行车使得中国人的身体要比美国人长得匀称些——肥胖的中国人是罕见的。

北京饭店新楼的房间，舒适设备还过得去。不过，比起最近搞得富丽堂皇的东京大仓饭店来，就显得不善陈设，土气。有免费供应的啤酒和洗衣服服务项目，只要找一下楼道里的服务员马上替你解决。要是给任何人以小费，这就是一种侮辱，千万不能这样做；他们有自尊心。

门户不用上锁。在中国你的钱不会丢失。

同华盛顿和其他首都一样，北京是一个阴郁的城市，也可能是中国的最阴郁的城市。在这里住在政权脚下的人们面孔铁板，街道和商店都有一种一体化的萧瑟。这可以从那冷冰冰的广场和纪念碑，以及人们知道权力角逐正在暗中进行，但是心照不宣，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

住在远方城市里的老百姓，如北方的哈尔滨、沈阳、抚顺、南方的郑州、南京、苏州，是较为逍遥自在的，以至住在纽约式的不大好弄的上海人也如此。从松花江到黄河，从长江到广州的珠江，再到广西省桂林附近，在圆锥形的世外桃源式的小中流过的碧波荡漾美丽的漓江，老百姓们比起那郁郁不乐、心力交瘁的住在北京的人们来，看来要精神得多，友好得多。住在北京的人们由于政权就设在那里，是受压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黎明，在北京的马路上散步，骑自行车的人开始多起来，到处都是锻炼身体的人。年老的，年青的都在马路旁边寸草不生夯实的泥地上跑步，一些妇女正在清扫这些马路。太阳出来以前就有人在打篮球和排球，人民大会堂前边的广场上回响着身穿运动衣的青少年的步伐声。

在紫禁城内石条砌成的庭院里，过去曾是皇帝坐在大屋顶的宫殿里检阅御林军的地方，解放军有节奏地在认真地做柔软操，年年的士兵们在跑步前去吃早饭的时候还主动屈伸他们的双臂。冬天，老太婆都单独地站在那里做曲膝锻炼。当看到一个美国人在曙光中独自走过，所有的人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瞪着看，但没有敌意。

每天要有一万人走进皇宫的各觐见殿和博物馆去参观他们的先人几千年前为历代皇帝制作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品和珍宝，这些东西曾和皇帝一起埋在墓里。不知道他们在参观的时候作何感想。他们看到中国的艺术目前已沦为宣传画，画中对农民与地斗，士兵与敌人斗加以理想化；戏剧已变成好莱坞所不敢尝试的政治宣传。音乐已被沦为“闪闪的红星，指导我去战斗”，“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之类的东西，在扩音器中，由学校儿童，杂技演员随着刺耳的胡琴到处唱。据说这就是当代的艺术，不过这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如同新闻学在中国所代表的那样，这是一种露骨的思想灌输的做法。

《人民日报》（日销四百六十万份）编辑潘非解译说：“在我们国家，宣传是一个好的字眼。你们把宣传看成是不光彩的，象是蛊惑人心一类的东西。我们都用它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路线。

“我们的看法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各种报纸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或政治实体服务的。我们的任务是传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把政策，政府的路线告诉人民。因此，我们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有力工具。我们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

“中央委员会制定出写社论的政策以传播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责任就是遵循我们的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关于带调查性的新闻报道或编辑上的问题就讲这么多。

然而，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比文学艺术在政治上的堕落更为令人伤心的是毛主义的领导要求学校教师、大学教授唯命是从。这些人正在制订出下一代人想问题的方法——而这新的一代，人们加以期望，将在这一个现代化的复杂的世界中把中国带入一个开明的领导的地位。

知识分子在想些什么已被封住，在西方人面前缄口不谈，要不就是把它藏在热心地背诵人们意料得到的教条这一假象后面。而且只有那种麻木不仁的人，才会以批评的口吻，促使那些思想上被禁锢的人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一位教授为了说明自己放弃去作学术上的探讨是有道理的，对这个政权作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叹性的评语：“光看一看他们干了些什么”就够了。

这位教授的意思当然是说毛的共产主义已把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统一起来，这个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为了历代皇帝和剥削者服劳役流尽了血汗。毛的共产主义使得以前拜倒在别人脚下的民族、今天有了自豪感。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衣、食、住问题。毛的共产主义拿走了有福之人的财富，在人口几乎是美国四倍的国家里，给每一个穷人安排工作，分配粮食。作为一种回报，毛的共产主义则要求人们遵守国家的纪律，服从思想灌输，这种思想灌输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僵死，而艺术本来是一种个人的感召，也意味着教育目标的堕落，而教育的目标本来是对真理的追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有很多想法，他们小心谨慎地闷在肚子里不说出来。但是，对于城市里和农村的一般群众来说，不难理解，他们就不那样复杂，乐意着眼子“他们干了些什么”，乐意对“他们干了些什么”表示感激。

毛可能不留心人们的脑子在想什么，但是，按着西纳特拉的说法，毛知道人们的心里所向往的是什麼。

（摘译自《圣彼得堡时报》）

《崛起的中国缓慢地打开了大门》

千峰环野立
一水抱城流。

.....
.....

这首诗雕刻在桂林市这个人间天堂的一座石灰岩山的一块巨石之上。古代诗人这种细腻的善感多情在朝着工业化时代爬行的现代中国的毫无性别的共产主义中是难以找到的。

漓江郁郁葱葱，沿岸风景绝美，蜿蜒穿过广西省的圆锥形的重重山峦注入广州上面的浑浊的珠江。

但是，这个美国和全世界将必须了解的，蓬头垢面终日忙碌的中国同生铁一样冷酷无情。那些管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实用主义者已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或者说这种信任在很久以前就从他们身上被消除了。他们的指导口号是自力更生，他们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使得他们把进口一台非自己发明或改制的机器视为内疚。

这使得中国在向工业化挺进中缓慢下来，因为他们在重新创造西方技术。他们内部的政治统治也是如此把中国人的思想象现在这样从与世界知识联系分隔开来，而换来的是暂时的政治稳定和人们接受一个非常艰苦的命运，并竭力把自己的汗水变为他们的政权不愿去借贷或乞讨的发展资金。

邓小平副总理所能想到的对欣欣向荣的台湾进行的最恶劣的诋毁就是它的资本全是外国的。

这个巨大的国家正在一个心眼地追求着自给和内部安全，勘探油井、开采煤矿、制造轮船、仿制飞机，治理河流使之推动中国制造的涡轮机，把稀少的物质用在军备上；同时正在僭取一个不可避免的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实力地位。

在国内，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已经把历史上不团结的人民团结起来，并正在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贫困到处都存在，但是对于满足最低生存需要不是无能为力

的。中国个人没有汽车和电冰箱，然而亿万愈来愈多的人有自行车和脚踏缝纫机。农药、灌溉、洪水控制正在减少饥荒的可能。

在大跃进这个错误的开端之后，毛明智地接受了把重点放在农业上以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对人们来说生活就是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安逸和消费品是很少的。但是这个有着传统勤劳的人民有这样的自豪感：尽管前途象现在这样凄惨不堪，但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来安排”。

几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也许可以对亿万人做出独裁的决定，但是人们活动在他们当中就会察觉到人民的精神是强大的。他们的思想意识统治的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令人厌倦，正象物质享受的贫乏也最终会令人恼火一样。但是在围绕着国内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危险——象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中国修正主义分子是应憎恨的人物——以及第二位的外国敌人的威胁的大肆宣传下，毛的苦干和流汗的纪律看来在目前大体上被接受下来了。

在国外，中国人似乎还不愿意把自己直接卷入制造全球性问题或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在干涉他人事物和支持人们这样干之间有着自己的划方。他们会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叛乱分子发出毫无虚饰的支持信电，使得那里的现存政府十分恼怒。但是甚至邻国北越从中国那里得到的也只是它从苏联接受的战争装备的一小部分。中国人不信任欧洲的共产党，理由是他们尾随俄国。他们宁愿迎合在非洲或其他地方的第三世界的潜在的毛主义分子，如果这样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收效，那么中国人懂得时间。

美国在从印支撤出后必须在太平洋选择一个当前的政策，否则世界那个部分神经紧张的国家就会象块块金属那样移向即将占上风的强国的磁场。就这点来说，正确地了解中国的意图及其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公然认为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比起美“帝国主义”更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但是这个政权在教唆中国人要把苏联人当作他们的威胁最大的包围者来憎恨的同时，它却采取了似乎是矛盾的立场，即苏联现在还不打算进攻中国，而是着眼于欧洲和中东。

北京的最高的官员们对美国军事力量不但不害怕，而且还指责美国在看到俄国人采取攻势时处于守势。他们公开赞成美国保护其邻居日本

的保证，并且在私下，他们被认为试图制止北朝鲜进攻南朝鲜，这显然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目的。

象泰国、菲律宾那样的神经紧张的国家在美国在越南的努力失败之后，打开了通往北京的道路，同中国建立了关系。但是他们很巧妙地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土上存在着苏联人的压力，这是中国人所畏惧的。

中国主要是畏惧苏联的包围呢还是试图把美国和俄国推向一场格斗而狡猾的中国人将从中渔利，这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是有待于权衡的问题。官方中国人对美苏目前缓和政策的蔑视，大概不会改变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对对方意图的判断。

但是尽管要慎重行事，人们可以相信在今后几年内在太平洋地区某种利益共同体将在中美之间逐步形成。

首先，美国海上力量的存在也许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以抗衡苏联海军。根据西方标准中国海军还是一支原始的力量。它看到了苏联海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行动。美国的撤出不但会把通往中东石油的海上要道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使日本到波斯湾的国家恐慌不安，而且会把中国自己的沿海置于莫斯科的随心所欲之下。

其次中国正在竭力击败俄国，与经济上强大的日本人建立主要的贸易联系，同时又不鼓励具有军事潜力的日本重新武装。这里同美国的共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如果处于亚洲下端和中东里面的块块金属除了莫斯科以外还有某个磁心，可以使之产生心理上的倾向的话，世界的力量平衡大概会是势均力敌的。很明显，北京对河内这个妄自尊大的首领对俄国将采取什么方向表示某种不安。

设想中国的好战的毛主义分子能够正式成为象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灵魂兄弟，那是不现实的。如果美国人在试图在世界这部分急速动荡地区稳定力量平衡上认识到与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并采取行动，那么美国人低估和平的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尽管中国人谈到台湾时声色俱厉，从中国访问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个下定决心的但忧心忡忡的崛起强国正在与美国人寻求某种共同的事业并为更接近的关系敞开大门。

至于美国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除了极好的烹调和乐于工作之外，能从中国人那儿学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亚，访问者的印象是：充分

就业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还没有解决的也许必须要解决的人类的挑战。

然而一个自己承认没有精神学专长的中国矫形科专家猜测：自从革命以来中国精神病人大大地下降了，因为人们不再为下一顿饭而分心。一个人活着，他就有工作做。闲置、失业劳动力被认为是一个制度给它自己带来的最不经济的损害。

这次中国之行所见到的最严酷的景象并不是在荒凉的郑州，高傲的老人与毛驴并套拉着石头板车，而是一个破产的老头身边放着一个破罐头桶做成的杯子坐在五光十色的香港的九龙渡船的台阶上——而在那儿，几乎每个人都赚好多钱。

（载《圣彼得堡时报》）

《中国进入工业时代》

中国有句老的问候话，就是在“你好”之后再问“你吃了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残余，在那个时代，一个中国农民每天有一点东西吃是例外，却不是常规。

共产党政权统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八亿、或多至九亿人民有饭吃、有房住、有衣穿。

取得这三类不是那么丰富的必需品所付出的代价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要感到吃惊——老年男人驾着毛驴拉着一车车的煤矿和石头；在男的灌田、用水牛耕耘准备种水稻之前（现在双轮手扶拖拉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但牲口仍是主要动力），女的和小孩子在麦茬地里撒人粪。农村的住房仍然以土房为主，这些房子多半是泥地。一个农民在攒了一些钱后，他的愿望就是买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或一块手表。

而且他还经常受到喋喋不休的、训令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工厂经理、教授还有工人和农民说起话来象上了发条的机器玩具——毛主席的像处处皆是，他是好人；刘少奇、林彪和孔丘是坏人。丰收高产出自毛主席的路线，一切以历史上的两个阶段来衡量——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把人民从他的对手刘和林修正他的（思想的）修正主义之下拯救了出来。歉收低产是这两个人搞的鬼。这样一种失去知觉的经文背诵，好比在旧时代向皇帝或地主叩头一样机械。

异议是不讲出来的。不同政治哲学的讨论一到涉及对毛主席的一贯正确表示怀疑时，就倏地停止。做父母的异口同声说他们对儿女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被分配去为国家进行劳动。哈尔滨有一个父亲说：“我的孩子不是我的资产，他们是国家的财产。”

个人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欲望。为了使受过教育的人谦虚一点，就把他们送到工厂或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由听话的没有好好受过教育的人指导学校的老师。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由国家订出纪律、群众执行。大学教授过去受过寻求真理的训练，现在声称他们的使命是训练青年为党服务。对那些具有好追根究底的头脑的人则有意识地加以压抑，以确保无产阶级对知识比他们高的人发号施令。

扩音器扎耳的声音叫醒了公鸡，把群众叫出来，在军乐的配合下，“一、二、三……”有节奏地做柔软体操。这种如此严格地组织起来的人对顺从都有了条件反射，以致现在受到礼遇和友情的美国人从骨子里感到，党的路线一旦突然转变，这个城市的广场就会充满愤怒的仇意，取代目前的挥手和微笑。

无论在破旧、拥挤的城市，还是在到处是泥土的辽阔的乡村，都没有什么美丽动人之处。土地就是长粮食的，不种花卉。破烂的城市中的大厦上了油漆，这种奢华只能使得更多的青年想脱离务农的公社到有明亮电灯的城市里去。生活必须是斗争、艰苦而又原始。仇恨的怒火丝毫不许减弱，因为只有阶级仇恨、而不是孔老二的中庸才是防止奸诈的资产阶级在农民阶级中进行复辟的纯青之火。永恒的手工操作，象尺蠖前进那样地逆流拉牵这一痛苦难挨的劳动，扁担上肩挑的重负，黄昏时分闷热的小屋里面是光秃秃的，如果不从美国和中国的时代角度去看待这些，那么这一切顺受都会使西方的参观者感到沮丧扫兴。

这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水平只是战后的产物。凡是住在符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时曾称之为美国的头号经济问题的南部各州农村里的人，还能记得那种比今天中国农民好不了多少的狼狈生活。中国农民现在住的不是陈旧的陋屋、室内没有管道设备、没有自来水、电、电冰箱、以及没有汽车吗？我们就在这一辈子也曾经这样生活过。中国农民不是用驴或牛犁地、用手播种、锄草、从桶里一勺一勺舀水浇地、摘棉、收割谷物和屠宰自己喂养的猪吗？我们也会这样做过。美国人也曾过过没有钱的那种生活，从自己的地里挖土豆、用面袋缝制衬衫、把孩子从学校

叫回来帮助播种和收割，因为他们没钱雇工。在那种艰难困苦岁月里，他们的道德品质也是被这种或那种基本信仰所规定或影响的，那些小村镇曾被要求对这种基本信仰奉行不悖。

毛是中国的神，他所宣扬的加尔文式的苦行主义是引导和宽慰生活在悲惨命运中的这些农民的经文，而这种悲惨命运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是过来人。不过这样一些美国人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还能憧憬他们的孩子通过受教育以及自由和竞争进取这一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人才能，争取一个较好的生活，从而有一个比较光明的个人前途。而毛只给中国人这样一个前景，即通过群众性的斗争，有一天整个社会、尤其是最最贫苦的人，生活稍微有点改善。

可是从中国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点改善非同小可。中国的老一辈曾在日本侵略者的血汗工厂干活，这些侵略者只给他们吃橡树子；他们也曾绝望地为残酷成性的地主种过地，这些地主居华屋，而替他们干活的农民却在挨饿。他们记得1941——1942年的灾荒，仅河南省就有三百万人死去；他们也记得更早一些，在1938年，蒋介石的军队为了拦截日本人，炸开了黄河堤岸，淹死了八十万他的同胞。他们也目睹姊妹们被卖掉或者为了有口饭吃被送给别人。

中国大地的风光仍然是光秃秃的缺少树木，这不仅因为群众需要木材做木炭以象过去一样以此烧煮饭菜，而且也由于不少中国人吃树皮的缘故。当蝗虫吃掉他们的庄稼的时候，他们就吃油炸蝗虫。

河南有一个劳累不堪的农村妇女在她的一所有两间房的泥屋里，坐在一张毛主席像下面骄傲地说：“解放以前我们上无片瓦。”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以来都不统一，它饱受各类冒险家和跨国者的剥削，它那几亿贫民只有死去。

在充分估计中国共产主义成就的时候就要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全体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到只要小小的一点化费就可以不愁足食、不愁化、不愁穿，他们通过为国家进行艰苦但看来是心甘情愿的劳动所挣来的菲薄的工资中支付这一点小小的化费。现时，在毛的领导下，它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前所未闻的功绩——不管他们在个人自由方面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但是对农民群众来说似乎不是便宜的，因为农民觉得能维持生活已是他们过去一直梦寐以求的最大的奢望。

在他们的要求和欲望提高的时候，情况就会复杂起来，然而这是后话。

他们现在所看到的终于不再是桌子上的一些吃的，而是看到卑贱者有他的尊严、骄傲地做人这样一个中国已经有了开端。他们看到，在毛主席要绿化中国的指示下，千万棵白杨树、柳树、梧桐树和桉树衬绿了公路、铁路和河道的两边。

他们看到尽管城市是破破烂烂的、单调乏味的，街道还是每天都扫得干干净净的；公园里并不是瓜皮纸屑满地；而滴滴涕喷雾器毫不留情地追逐着那几只残忍的苍蝇和许多生存下来的蚊子（做这一切是付出最大可能的代价的；在中国，能看到的鸟类不多，吃粮食的麻雀是敌人，更是例外）。

无论在那一个城市还是在农村各地，都看不到乞丐、小贩、妓女、酒鬼和吸毒的人；他们感到自豪的是，由于偷窃行为是很少发生的背叛革命的行为，外国人把相机和钱放在旅馆的房间里而用不着上锁。

他们的国家在各方面仍然和外界隔绝，就好像十九世纪的皇帝仍曾力图不和外界接触。可是中国政府现在带着戒心在墙上开了几扇门，向外国参观者开放；在这堵墙背后，当前指导性的毛主席思想是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这种对互相依赖的猜疑把群众困锁在繁重的手工劳动之中，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再发明了一次车轮，而这些工业时代的后进还感到一种先驱者的光荣哩。中国的女店员对新型的台式电子计算机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甚至还没有使用现金出纳机，仍然在用算盘。但是他们会告诉你，算盘是中国自己造的。

（载《圣彼得堡时报》）

《新思想指导着中国的工业》

三十二岁的贾清路（译音），以前是工人，笑呵呵地转向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于栋臣（译音）向我们解释说：“老子有很多旧思想。”贾现已接替于担任了上海一个汽轮机厂的厂长。

上了年纪的于栋臣点点头，开朗地向我们笑着。文化大革命中他从厂内最高的职位上被搞下来以后，今天已经五十九岁了，怎么又能回来在贾清路这个鲁莽的年青的中学毕业生手下当起总工程师来呢？

贾说：“于先生对自己的错误思想有了认识”，“所以他被重新选入领导机构，我们就在一起了”。当然，今天贾是坐在过去于的交椅上，当于是厂长的时候，贾还在车间里磨床上干活呢。但这就是六十年代后期，当毛泽东决定“高级技术人材”必须从领导岗位上免掉而由无产阶级代替的时候在全中国实行的大变动。

贾从生产线上带来一股虎里虎气的干劲以及政治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他在教育和行政经验方面所缺少的东西。

贾是一个挺让人喜欢的大老粗，他典型地代表了在全中国出现的一类能干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由于实行毛主义的政治领导以及本身土生土长的才干掌了权。而于则是那种只知道搞业务的失败者的典型。贾承认他是当初“批评”和帮助搞掉于的工人之一。他说当时厂里并没有暴力行动，但辩论得很厉害。这一定是很生动的辩论因为军队都不得不开进来管理工厂，一直管到两年前。贾坚持说，然后在大伙“一致同意”下，他被提到第一把手的岗位（他说“用表决这办法，不管是举手表决，还是不记名投票都有很多缺点”。）

在哈尔滨时我们曾得到另一位汽轮机厂的负责人较为坦率的答复。他说他们的厂革委会是选举产生的，但他本人则是由“上级”派来管理工厂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

不管事情的过程怎样，反正今天象贾一类的人在管理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而象于一类的人或者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相处或者是下了台。从政治上说，事情就是这个样，不管在经济上是有利还是不利。

贾这个厂里的工人，平均每月工资三十五美元（不用交税），每周工作六天，四十八小时，根据政治觉悟和表现可以增加工资，但工龄长短只是第二位的因素；在公寓房子里住一间房，厨房和洗澡间和别家合用，每月房租为三个美元或不到一些；每人每月的伙食为六到八美元，如果有积存就全部存入银行，短期利率是百分之二，长期百分之三点二五。

过去二十年来，工人的伙食开支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国家每年要化几十亿人民币的补助使另售物价保持不变，从一九五〇年以来，国家支付给农民的粮价已提高了一倍。

如果工人要到全是国产物品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去买东西，他必须先把钱积蓄起来，因为买东西全是现金交易。中国还有消费贷款。在第